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在公共社會學奠基人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逝世一周年之際，敝刊邀請了幾位中國社會學者，撰文回顧他的學術生涯和貢獻，探討其理論創見對中國研究同行的啟示，並剖析公共社會學在中國的實踐和挑戰，敬請讀者留意4月號的評論專輯。

——編者

原敬對華政策的兩個面向

郭循春關於原敬對華政策分析的論文〈理念與現實的糾葛：原敬對華政策構想與實踐 (1915-1921)〉(《二十一世紀》2025年12月號) 包含了近代中日外交以及日本的近代政治兩個面向。首先，原敬於1918年組建了日本憲政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政黨內閣，此種政治形式一直延續到1932年首相犬養毅被暗殺，是為戰前日本的政黨政治。在此意義上，原敬的內外政治理念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頗具代表性。其次，論文聚焦於原敬擔任政友會第三代總裁的次年(1915)到首相任上遇刺身亡的當年(1921)，是其個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最大政黨與政

府的對華態度。再次，《原敬日記》記錄了原敬從十九歲分家獨立(1875)到六十五歲遇刺去世當天的內心實錄，歷時近半個世紀。日記不僅是原敬個人的生涯記錄，也是一線當事人關於日本時政的第一手史料。基於上述三點，原敬的對華政策對深入了解近代日本的整體對華政策和政黨政治都有着重要且獨特的價值。

作者從原敬的日記入手，結合其在具體實踐中的變化，來說明日本對華不干涉的理念和不同程度干涉的現實一直處於衝突和妥協的調整態勢中，而原敬的對華政策正是這種動態矛盾的縮影。就此矛盾性而言，或許可以生發兩個方面的探究思路：

第一，原敬作為政府首腦。原敬建立的政黨內閣，與藩閥內閣、元老的超然內閣以及軍部掣肘的內閣都不同，有一定的抗衡力量，對華政策無法首尾貫徹，乃至自己遇襲身亡，都顯示出體制內部的危機。政黨始終在與軍部之間的矛盾中妥協，而構想與實踐的張力實則反映了帝國憲法框架束縛下政黨政治的內在矛盾，外交矛盾根源於政治架構的內在扭曲。

第二，原敬作為職業外交官。外交是原敬踏入政壇的初始領域，他並不贊成外交僅僅被視為一種技術性工作，「通曉妙才」、「熟達敏腕」才是理想目標。簡言之，在具備能力的同時，靈活是必備素質。外交事務上的協調主義，正是體現了這一點。這種協調主義也被他運用到政黨內外、議會內外，例如與不喜政黨的元老山縣有朋的協商。

論文論證較為詳實，如要補充，就日記內容本身而言，雖然原敬的對華政策思考主要集中在政黨總裁時期和首相時期，但在稍早的擔任內務大臣期間(1911年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原敬已就四國借款提出過自己的擔憂。他認為日英都在中國南方有着很大的利害關係，告誡不宜因為借款刺激革命黨，日本也不可採取那些會招致清廷官方與革命黨雙方不快的政策。對於清廷的局勢，原敬顯然是保持關注的，並且同樣以一種協調的立場靜觀各國的變動。

朱坤容 廣州
2025.12.23

青木宣純與護國戰爭

護國戰爭爆發後，以參謀本部為首的日本陸軍在積極推動大隈重信內閣確立的反對袁世凱政策之餘，亦深度介入中國政局，並大力援助護國軍一方，已成為學界共識。然而，參謀本部究竟如何將政策意圖落實為具體操作，又如何聯絡

中國各方勢力推動反袁風潮之形成，卻又略顯朦朧。

承紅磊近年已就護國戰爭期間的日本因素展開一系列深入考察，揭示日本內閣與軍方對華干涉程度之深，影響之深遠。延續此一路徑，其新作〈縱橫捭闔——護國戰爭期間青木宣純的在華活動〉（《二十一世紀》2025年12月號）進一步聚焦於日本陸軍內尤為激進的參謀本部，以青木宣純作為聯絡各反袁勢力的中心人物，廣泛運用中日雙方未刊檔案及已刊文獻，並以「支援反袁勢力」及「策反北洋系」兩條線索作為論述骨架，探究青木宣純於1916年1至7月在華半年間所開展之具體活動。

就結果而言，青木宣純對各反袁勢力所承諾和部分達成的資金援助及武器支援，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政局；其對馮國璋、張作霖二人的拉攏與策反也都無功而返。加之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病逝，反袁的口號隨之煙消雲散。綜觀全局，青木宣純的確可謂「縱橫捭闔」，但不可否認的是其諸多活動最終收效甚微。也正是因此，青木宣純的相關活動才會長年被埋沒於故紙堆之中。而本文的價值正在於，作者通過對零散史料的搜集與重組，較為具體地呈現一介日本軍人如何得以干涉中國政局如此之深，讓讀者不禁遐想：如若袁稍晚死，時局變動是否會大有不同。

不過，本文仍有若干可再深化之處。其一，作者對青木宣純的行動脈絡已有相當深入的剖析，但對其本人的政治構

想卻着墨甚少。通讀全文，其活動僅為達成反袁這一目的，對於袁世凱退位以後的政局重組似未有具體方案。青木宣純雖隸屬於參謀本部，卻未必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言聽計從，作者亦多次指出其行動上的自主性。那麼，青木宣純自身的對華政治藍圖如何，尚有待進一步闡釋。其二，陸軍對反袁勢力之借款及軍需支援，多需透過日本經濟機構或工商業者協力方能落實。日本財界基於何種經濟或政治考量而選擇與軍方協作，似也值得進一步深挖。總之，期待作者早日將研究成果付梓成書，以惠學界。

金子豐 京都

2025.12.29

抗戰前後的國際合作

台北中央研究院張力教授的專書《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透過台北國家圖書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所藏檔案，揭示國際合作在近代中國制度建構中的重要角色。陳玲燕〈抗戰前後國際聯盟對華技術合作的起始與落幕〉（《二十一世紀》2025年12月號）一文，則進一步運用日內瓦聯合國圖書館與檔案館的第一手資料，討論了1930年代抗戰爆發前後至40年代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對中華民國所展開的技術合作及其終止的歷史過程。鑒於學界對抗戰時期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整體認識仍相當有限，此一主題具有高度史學價值。

本文提醒我們，即便在戰爭與國際政治高度不對稱、高度緊張的情境中，非國家行為

體（如國際組織與專業社群）仍曾試圖透過知識、技術與醫療實踐維繫國際合作。正是這些脆弱卻真實存在的連結，使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抗戰時期中國與世界之密切關聯與紐帶。而這些國際合作經驗，正是理解戰爭期間「文化國際主義」及其歷史限度的重要線索，也為跨國史研究開啟了新的問題意識。

本文的貢獻，在於將抗戰時期中國的技術建設與醫療衛生事業，重新置於國聯的制度脈絡中加以理解。作者細緻重構國聯內部對華技術合作的討論與運作過程，並揭示其所呈現的「雙重性」：一方面，國聯內部確實存在以專業知識與技術援助協助中國的理想主義動能；另一方面，其行動又深受國際政治結構制約，在中日衝突升溫的背景下，始終避免觸及政治與軍事爭端，對日本態度極為謹慎，最終導致合作於1941年告終。

本文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國聯「醫療防疫」對華援助的討論。1938年國聯防疫團抵達中國，展開實地醫療與防疫工作，此舉不僅體現技術合作，也帶有鮮明的人道主義色彩，顯示國聯曾嘗試超越政策建議層次，直接介入戰時醫療實踐，構成一種非常態但真實存在的國際合作模式。此外，本文在細節方面不乏很多可以挖掘之處，例如防疫團在人道救援上實際取得了哪些進展、救治了多少病患與傷員、其與中國本地醫療人員與衛生機構之間的生態，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關係，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邢承吉 天津

2026.1.14